

# 逸周書

新譯

(上)

行印局書民三 /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/ 類 史 歷 / 譯注 恩鴻牛

牛鴻恩  
注譯

新 譯

逸

周

書

(上)

三民書局  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逸周書 / 牛鴻恩注譯. -- 初版一刷. -- 臺  
北市: 三民, 2015  
冊; 公分. 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6019-2 (一套: 平裝)

1. 逸周書 2. 注釋

621.51

104007278

◎ 新譯逸周書(上)

注譯者 牛鴻恩  
責任編輯 劉培育  
美術設計 蕭伊寂

發行人 劉振強  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 
電話 (02)25006600  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 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5年5月  
編號 S 033410

上下冊不分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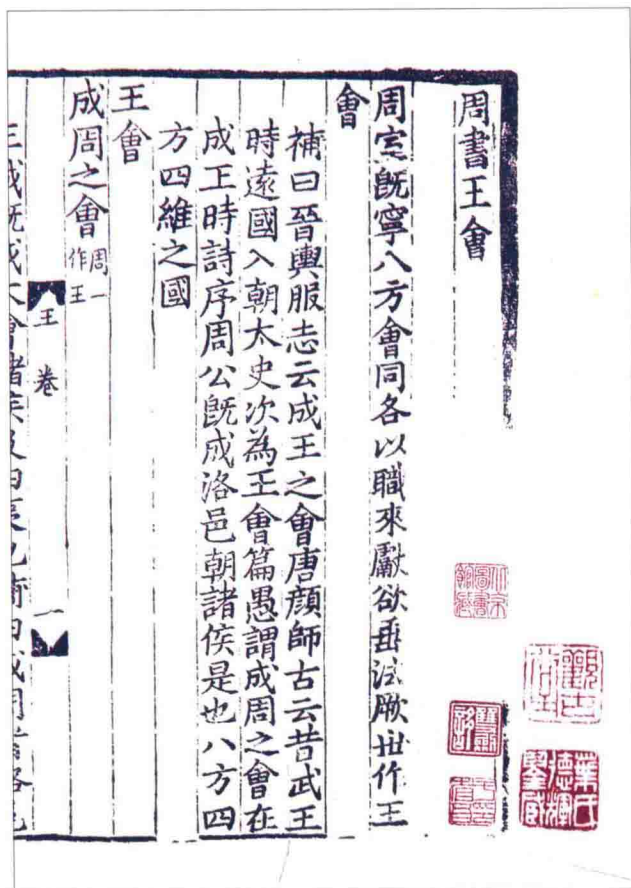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6019-2 (一套: 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

圖一 《周書王會補注》書影。

《周書王會補注》一卷，宋王應麟撰。元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明初修本。北京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。



圖二 利簋，又名「武王征商簋」，北京市中國國家博物館藏。  
是迄今為止所發現最早的西周青銅器，腹底有銘文四行，三十二  
字。記載甲子日早上武王伐商，七天後的辛未日戰勝商朝，與《尚  
書·牧誓》、《逸周書·世俘》所記可相互印證。



圖三 天亡簋，北京市中國國家博物館藏。  
簋內底部有銘文八行，七十八字。記述武王滅商後祭告文王，天亡  
助祭有功，武王賞賜之事。



圖四 何尊，陝西寶雞市博物館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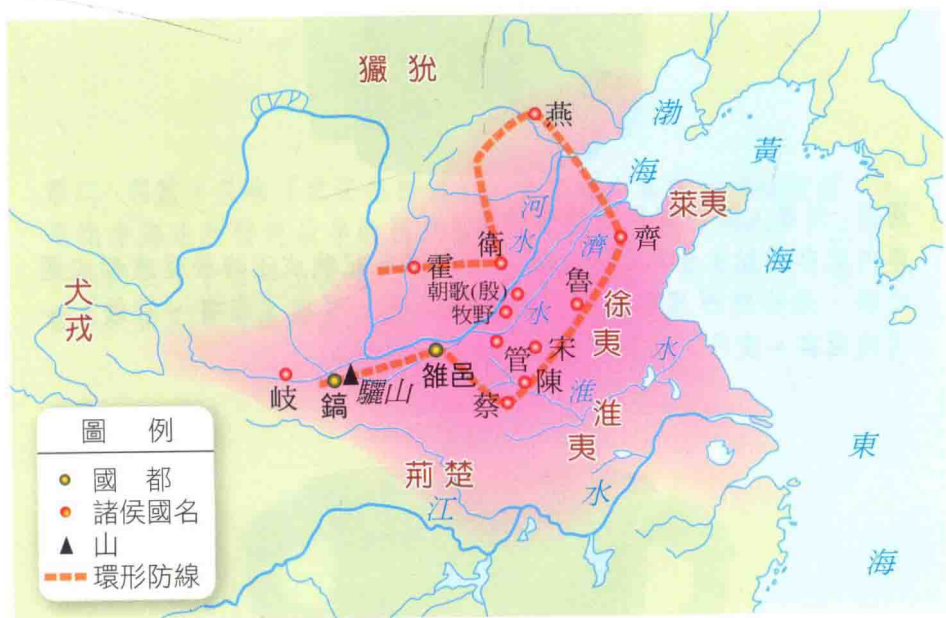
尊內底部有銘文十二行，一百二十二字。記載成王時營建東都成周之事，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資料，可與《尚書·召誥》、《逸周書·度邑》所記印證。



圖五 小臣單觶，上海市上海博物館藏。

觶內底部有銘文四行，二十二字。記載成王平武庚叛亂後，至成師，周公賞小臣單之事。





圖六 周公東征後的西周形勢圖。

##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



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## 導讀——《逸周書》寫作時、地考

《逸周書》中戰國作品的寫作時代頗有爭議。劉起鈺先生以為，其中至少十餘篇為春秋作品，李學勤先生認為春秋人所引、文體相類者有更多篇章。本文通過文獻比較，認為《逸周書》除作於西周史官的九篇寶貴史書（有的篇章有後人修飾）以外，其餘四、五十篇均為戰國人所作，漢代作品三數篇，時代難以明指者兩三篇。其與《管子》、《周禮》等齊國作品思想、文體的相似性，說明這些作品應當作於齊國稷下，明顯受到戰國中期秦法家、齊法家及齊五行家、黃老家思想影響。以數為紀、頂真修辭格也盛行於戰國。《逸周書》多篇改《六韜》等書之「太公」為周公，是它出於田齊的鐵證。已在網上得知日本學者谷中信一於《逸周書的思想及其成書》中提出《逸周書》成書於齊國，但與本文著眼點並不同，又其論述簡略，請讀者參閱，並給本文以指正。

### 一

和先秦其他古籍一樣，《逸周書》初無定名，《書》、《周志》、《周書》、《周記》並用，見於多種記載。《左傳》稱《周志》、《書》（文公二年、襄公二十五年），《韓非子》稱《周書》、《周記》（《難勢》、《說疑》）。前人即以「記」、「書」釋「志」字，定名於《周書》顯然在韓非以後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開始稱為《逸周書》，意即《周書》逸篇，因為劉向曾說《周書》七十一篇「周時誥誓號令也，蓋孔子所論百

篇之餘也」。(《漢書·藝文志》師古注，班固《漢書》第一七〇六頁，中華書局)《周書》為七十篇，說七十一是含〈序〉而言。西晉初，博士孔晁作注，篇題中都有一個「解」字，應是孔晁所加，「蔡邕《明堂月令論》曰：『《月令》第五十三』」，(朱右曾《周書集訓校釋·周書序目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·別史類》)可以為證。〈序〉言各篇題目，也沒有「解」字。

唐初，顏師古所見本七二十五篇：「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。」師古後又七三篇，今存孔注四十二篇。但時代晚於師古八十年的劉知幾說：「凡為七十一章，上自文、武，下終靈、景，甚有明允篤誠，典雅高義；時亦有淺末恆說，滓穢相參，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……斯百王之正書，五經之別錄者也。」(《史通·六家》，浦起龍《史通通釋》第二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)劉如果未窺全豹，僅憑殘書而作如此評價，似不合情理。時書雖然手抄，古籍不斷毀佚，也不斷抄寫，並非只有一種本子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：「《周書》十卷汲冢書，似仲尼刪書之餘。」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為「《汲冢周書》十卷」和「孔晁注《周書》八卷」兩種，宋遂有今傳本六十篇乃孔晁注本與《汲冢周書》合編之說，《逸周書》有了《汲冢周書》之稱，引發了一場長時間爭議。

孔注《逸周書》後，西晉咸寧五年(西元二七九年)，盜發魏襄王墓，出土大批竹書，即「汲冢書」，內有「雜書十九篇」：《周食田法》、《周書》論楚事、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(《晉書》卷五一《束皙傳》，《周書》論楚事標點從陳夢家《尚書通論》第二九一頁說，中華書局)，論者以為《呂太公望表》所引《周志》、《文選》李善注所引《古文尚書》、劉賡《稽瑞》所引《汲冢周書》均出「雜書十九篇」之《周書》。至引述其文，則為「文王夢天帝」，「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」，「竊子而育之，越姬居三月而死，七日而復」；「伯杵子往於東海……得一狐九尾」之類。孫詒讓說：「文例殊異」，「與其實不相涉」。(《周書輯補·序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·別史類》)劉師培也說：「與今本《周書》迥弗相類」，「與孔本《周書》靡涉」。(《周書略說》，《劉師培全集》第二冊第一五八、一六二頁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)這是記錄神異譎怪故事的「雜書」、

「瑣語」，與《逸周書》體例、內容均不相同，故宋代李燾《傳寫周書跋》已說「繫之汲冢，失其本矣」。近當代學者除朱希祖、蔣善國外，孫詒讓、劉師培及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《逸周書》與汲冢書無關。事實明白，此事之爭論可以終止了。

劉師培《周書略說》指出，「孔注之外，別本匪一」，王應麟《玉海》載沈約所說「《周書·謚法一》第五十六、《謚法二》第五十七」，就是「《周書》別本」。呂思勉說：「師古所見，蓋即孔晁注八卷本，不全。知幾所見，則蒙『汲冢』名之十卷本，無闕也。」（《經子解題》第三六頁，華東師大出版社版）故孔注或有或無。七十一篇何時僅存六十篇，朱右曾《周書集訓校釋·序》說：「未知何代，要在唐以後矣。」查南宋鄭樵《通志·藝文志》著錄三本：「《周書》七十一篇今存四十五篇、《汲冢周書》十卷、《汲冢周書》八卷孔晁注。」好像三者同在，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一種：《汲冢周書》十卷，孔晁注，凡七十篇。似乎無缺佚。而與陳振孫同時的高似孫說：「周書七十一卷，《竹書》內書。晉孔晁注，凡七十篇。」但在《程寤》至《八系（繁）》八篇下高注：「以上篇逸。」又在《箕子》、《考德》二篇下注：「二篇逸。」（《史略》卷六，校點本第八九、九〇頁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）又未列北宋已亡的《月令》，（蔣善國：邢昺《論語疏》已說《月令》「其辭今亡」，《尚書綜述》第一三五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缺十一篇，為五十九篇，連《序》為六十篇。可知，至遲南宋高似孫時和今天所見本已經全同。我們現在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補亡篇《程寤》，則為六十篇，連《序》為六十一篇。

《逸周書》是上自殷周之際下至秦漢的一部子史叢編。清唐大沛分其文體、內容為四類：訓告、紀事、政制、武備。（《逸周書分編句釋·凡例》，臺灣學生書局影印道光十六年手稿本）今人劉起鈺分為《書》篇、戰國兵家之作、戰國至漢的《禮》家書、成於漢代之文。（《尚書學史》第九六頁，中華書局）於是有人歸納為史書、政書、兵書、禮書。（羅家湘《逸周書研究》第五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依魯迅、胡念貽、楊憲益、譚家健意見，書中還有小說和民間歌謠，故應分為史、政、兵、禮、文學五類。

其中最值得重視的，是西周史書，呂思勉稱之為「所述史跡，尤多為他書所不見，實先秦舊籍中之瑰寶矣」。（《經子解題》第三八頁，華東師大出版社）多數研究者認為，〈世俘〉、〈克殷〉、〈商誓〉、〈度邑〉、〈皇門〉、〈作雒〉、〈祭公〉、〈嘗麥〉、〈芮良夫〉九篇，多是原始資料，非常寶貴，自是出於史官，其中僅〈作雒〉、〈克殷〉、〈嘗麥〉有後人增飾。周武王伐紂滅殷，是我國歷史上的大事件，〈世俘〉、〈克殷〉詳盡記述了武王出兵全過程和克殷具體情狀：出兵月日、戰爭時地、紂自殺、武王斬紂頭等等。〈商誓〉是武王克殷後對殷人的訓誥，是武王流傳下來唯一可信的長篇訓誥，文中反覆申明奉天革命、「保生商民」的對殷政策，生動表現了神人相通的原始宗教。〈度邑〉寫武王考慮在「中或（國）」建立新都，苦心焦思，奔波選址，立意改變周人偏處西方的政治局勢。一九六三年出土成王時〈何尊〉銘文：「惟珙」〔武〕王既克大邑商，則廷〔佺，敬也〕告于天，曰：『余其宅茲中或，自之辭〔乂，治也〕民。』」（馬承源主編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第三卷第二〇頁，文物出版社）即說此事。〈皇門〉是周公攝政後會見「大門宗子」，訓誥貴族群門，沿襲了原始社會末期宗族長老議事會的「民主作風」。（楊寬《西周史》第八六八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）訓誥中使用多個「德」字，可見武王到周公的思想發展，可與《尚書·周書》的周、召訓誥相印證。〈作雒〉寫周公東征以後，將要致政，決定在天下之中、雒水北、邛山南建立大邑成周，實現武王夙願。〈祭公〉寫祭公謀父語重心長地勸諫穆王改正缺失。〈芮良夫〉寫厲王無道，老臣芮良夫勸諫厲王，「德則民戴」，「害民乃非后，惟其讎。……後其危哉！」可與《國語·召公諫厲王弭謗》並讀。〈嘗麥〉寫周王鄭重修正刑法的儀式。《尚書》中關於克殷，只有一篇誓詞〈牧誓〉，建東都只在〈洛誥〉中略有敘述，其餘都是沒有的。九篇史書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，可以彌補《尚書》記載的缺漏，豐富了西周歷史。孟子不相信武王伐殷大量誅殺，認為「以至仁伐至不仁」何至於「血之流杵」。（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，《孟子注疏》第三八〇頁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標點本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）梁啟超說：「孟子理想中的『仁義之師』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，而《逸周書》敘周武王殘暴之狀，或反為真相。吾儕所

以信《逸周書》之不偽，乃正以此也。」（《中國歷史研究法·史料之搜集與鑑別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）郭沫若說「世俘」「最為可信」。（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第二六九頁，人民出版社）但因為如實敘寫，「世俘」受到已不能理解遠古歷史真相的後人排斥。三千年來，這些篇章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。

史學家楊寬先生指出：「西周重要的文獻，主要保存在《尚書》和《逸周書》中。春秋以前所謂『書』……就是最原始的史料。《尚書》和《逸周書》就保存有這樣的西周原始史料，因為這兩種『書』，原來就是『書』的選本。」「就史料價值來看，有些篇章的重要性是超過《尚書·周書》的。」（《西周史》第四八三、八五七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）這是很適當的論斷。

先秦稱之為《書》、《周書》、《周志》、《周記》，主要因為上述篇章。這一部分的寫作時代、史料價值都爭議不大。爭議大的是其餘五十篇中的絕大多數篇章。

《逸周書》或《周書》號稱「周史記」，但書中有多少篇史書，卻不易說清，這有三個原因：一是 一些篇章開頭或頭、尾，很像史書，也確有史料；二是使用了時興於西周，而春秋時已經不用的月相記時法如「既生魄」等；三是書中多寫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言行，實際卻是政論或兵論。如《大匡十一》、《程典》、《程寤》（殘篇），都寫文王在程邑的經歷，文王也確由程遷鄴，《大匡》寫在程遭遇饑荒，《程典》寫殷紂聽從崇侯讒毀動怒，《程寤》寫太姒夢商庭生棘，都可以補《史記》缺載文王居程的史實。

《程典》、《大開》、《柔武》、《小武開（武）》、《大戒》、《本典》用「既生魄」記時，「既生魄」等大量見於西周金文；又如《小開》開端寫文王三十五祀正月的月食，董作賓、勞幹都對它作過探討。（勞幹《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》第四一八頁，中華書局）《武順》「三伯一長曰佐，三佐一長曰右，三右一長曰正，三正一長曰卿，三卿一長曰辟」，劉師培認為此即《詩經·大雅·公劉》「其軍三單」的古三單軍制。《和寤》、《武寤》兩篇寫武王「圖商」、伐商「至于鮮原，召邵公奭、畢公高」。《大匡三十七》、《文政》說「王十有三祀，王在管」，也是武王的記事。《史記》篇提到二十八個滅亡之國，《王會》篇提到的六十

多個少數民族部落，都是有用的歷史資料。於是劉起鈺先生認為：

〈程典〉、〈鄴保〉、〈文傲〉、〈文傳〉、〈寶典〉、〈寤敬〉、〈和寤〉、〈大匡三十七〉、〈武傲〉、〈大戒〉、〈嘗麥〉以及〈常訓〉十餘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，其文字寫定可能在春秋時，因其中一些文句曾為《左傳》所引用，……〈常訓〉則有同於《洪範》之文。《尚書學史》第九六頁，中華書局。又見於《古史續辨》第六一五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李學勤先生更說書中有「好多篇」春秋時作品：

〈度訓〉、〈命訓〉等好多篇，可視為一組……其文例特點是常用數字排比……它們的年代也不一定晚，這一點頗關重要。」（《逸周書源流考辨·序》，西北大學出版社）

《左傳》、《戰國策》所載春秋時荀息、狼臆、魏絳等所引《武稱》、《大匡》（三十七）、《程典》等篇，皆屬於這一組。在書中占較大比例的這一組，時代也不很遲。同屬於上述一組的《小開》……《小開》月食也應重加審定。（《逸周書彙校集注·序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

劉先生「寫定可能在春秋」的作品十二篇，李先生「春秋時」一組含兩項內容，說「好多」、「占較大比例」，書中僅「用數字排比」的已二十餘篇。（周玉秀統計，書中「以數為紀」作品達二十三篇。《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》第二四九頁，中華書局）綜計劉、李所說則不止於三十篇。

我們以為，除劉先生所說兩三篇待究外，劉、李兩先生的論斷與作品實際不相合。因為細讀上述各



篇或其主體部分，無一不是戰國人思想、戰國文體、戰國詞彙與語法，儘管說話的常是文、武、周公、周成王。唐大沛曾經說：「是書原本有真古書完具者，有稍殘缺者，有殘缺已甚者，有集斷簡而成者，有取古兵家言指為文、武之書者，有偽敘首、尾強屬之某王時者，有本篇已亡調取他書以當之者。真贗相淆，純雜不一，誠不可不分別觀之也。」（《逸周書分編句釋·凡例》）很明顯，取兵書指為文武、偽敘首尾屬之某王、調取他書以當之，都屬於擬託，這明白是說，《逸周書》經過了很大幅度地加工修改，並非文章原貌。當今學者的研究和地下出土資料也可為唐說之證，例如本書的「周公曰」，很多是改變《六韜》的「太公曰」而來：

文王在鄴，召太公望，對曰：「與民人同德，□利相死，同情相成，同惡相助，同好相趨。」（銀雀山漢墓竹簡《六韜》，又見於傳本《六韜·發啟》之「太公曰」）

而《逸周書·大武開（武）》則說：

維王一祀二月，王在鄴，聞密命。訪于周公旦……周公曰：「……一有天維國，二有地維義，三同好維樂，四同惡維哀，五遠方不爭。」

明顯是吸收了太公望的兩句而化作了「周公曰」。又如：

武王□……民之于利也，□〔好〕之如冬日之□〔陽〕……民怨生。……樂哉……其時，稱賢時能而宜有才，則賢者歸之。……冬之必□也。思之如大暑之……□也，如大冬之于□〔陽〕也……（銀雀山

漢墓竹簡《六韜》

而《逸周書·大聚》則說：

維武王勝殷……告周公旦曰……周公曰……稱賢使能官有材而賢士歸之，關市平商賈歸之，分地薄斂農民歸之。水性歸下，民性歸利。王若欲來天下民，先設其利而民自至，譬之若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不召而民自來。」

簡本《六韜》嚴重殘缺，「民之于利也」以下一段話依照《六韜》文例自然出於太公，但到本書又成了「周公曰」。又如：

呂尚曰：「凡民者，樂生而惡死，惡危而歸利。」（銀雀山漢墓竹簡《六韜》，又見於傳本《六韜·文師》「太公曰」）

而《逸周書·命訓》則為：

夫民生而樂生，無以穀之，能無勸乎？……夫民生而惡死，無以畏之，能無恐乎？（以上三組引文見王連龍《逸周書研究》第六二—六五頁。但此與王說「汲冢周書為《六韜》」、「晉人對《逸周書》的整理」等無關涉）社

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）